

難以詮釋的香港身份

盧燕儀

香港，無以名狀

1998 年秋末，我在謝菲爾德（Sheffield）渡過英國的第一個秋天。為歡迎我們這群來自五湖四海的海外留學生，學校舉行不少迎新活動，「蒲吧」是眾多活動之一。我們坐在學生會大樓的酒吧，把酒言歡，不知誰的主意，大家開始訴說家鄉的故事。

坐在吧台右邊的男孩子，跟大家說他來自西班牙鄉郊，人長得又白又胖，熱情澎湃地將家鄉的大小故事，鉅細無遺地跟我們分享。我聽得出神，然而，內心最深、深、深處，卻在懊惱，我該說甚麼？

我根本無法像他那般道出家鄉的大小事情—馬鞍山是怎樣的？沙田發生甚麼大事？新界有甚麼傳說？我該怎樣說香港？我，心中，一片空白。

還有一天，我的好同房、來自秘魯的家比，突然問我：「香港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地方？」我不知何故，竟一臉不屑地回答：「香港充斥著大大小小的商場，極其量只算是個大商場而已。」

香港，為甚麼變得如此難以名狀？當我跟別人說香港是個物質社會時，為何竟如此不屑？那可是我在英國朝思暮想的香港啊！

後來，我回到香港，在家裡的書櫃找到了香港作家也斯的《越界書簡》。那該是我赴英前買下，翻過、看過，但總是似懂非懂，因此擱下了。他在〈怎樣可以通過別人的框架去說自己？〉中指出，香港不是一個貫徹的、完整的主體，它由許多不同的東西構成；香港不是一個可以暢所欲言的主體，而「總是個一直想去說又不知從何說起的问题」¹。

為甚麼香港故事這樣難說？為甚麼香港並不完整？我們的不完整，從何而來？香港，可以變得完整嗎？

文化研究學者霍爾（Stuart Hall），在〈文化身份與流離失所〉一文中指出，福柯（Michel Foucault）認為，知識及權力其實是兩面同體，知識就是權力。在殖民社會，被殖民者，不僅如薩伊德（Edward Said）所說，在主流殖民論述（或知識中）被說成是「他者」，被剝奪主體性；被殖民者本

身亦受殖民論述支配，透過內在強制及主體服從，將自己置身在這種權力之中，令自己也變成「他者」。

霍爾指出，被殖者若沒有積極抵抗這種壓迫，將會付出沉重代價，心靈扭曲、靈魂折萎，如法農（Frantz Fanon）所言，自我空洞：「沒有座標，沒有視野，沒有色彩，無國也無根的眾多個體——一群天使族人。」²

我就是帶著這樣的回憶及印象，試圖從無以名狀的香港殖民痕跡中，檢視九七前英國殖民論述以及九七後大中國國族論述，繼而解構主流論述中香港身份的不可說（unspeakable）及不完整（incompleteness），以及其可能對香港造成的主體喪失、停滯及沉淪。

在追求一個更美好香港的前提下，文章另一部分，以霍爾建基於異質性的定位論為藍本，試圖在英國殖民論述及大中國國族論述以外，探索第三種論述的可能，從而建構香港主體。

大英殖民下的香港故事

就讓我們先從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告別演說，探討英國殖民論述中的香港故事。

「今天我們要慶祝的，是本港市民不分男女，憑著沖天的幹勁和不懈的努力，無畏無懼，為本港歷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。他們當中，絕大部分是中國人，最初來到這裡時，一無所有，只是一群平凡的人，但是他們努力不懈，終能克服種種困難，取得非凡的成就。」

英國在香港的管治即將終結。我相信我們可以總結說，英國對香港的貢獻，是在這裡建立了一個完善的框架，使香港人能夠力爭上游。這個框架包括法治精神、廉潔開明的政府、自由社會的價值、具雛型的代議政制和問責制。香港是一個帶有英國特色的華人社會。從來沒有一個屬地，在脫離殖民管治時，能夠像香港這般繁榮昌盛，這般具備公民社會的豐富特質，既有各行各業的專才、不同的宗教、眾多的報章雜誌、蓬勃的慈善事業，又有正直忠誠、此志不渝地為公眾服務的公務員。」

香港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〈香港告別演說〉1997年6月30日

1997年6月30日，彭定康在滂沱大雨中娓娓道來的香港故事，是英國優良體系（法治精神、廉明政府、自由價值）加上中國人的良好美德（幹勁、辛勤、勇氣）所締造出來的經濟神話。

在英國殖民論述中，被殖民的港人，是帶有英國特色的中國人，是市民，是經濟人，是有愛心，是（為擺脫極權統治的）自由人；而不是有中國及或英國文化特色的香港人，不是公民，不是政治人（選民），更不是可以在香港當家作主的主人。

在〈文化身份與流離失所〉中，霍爾談及歐洲殖民經驗對加勒比海人身份認同的影響時，提及三種手段，就是排斥、強加及僭奪加勒比海人的文化身份。我在這裡嘗試以此作為參考，探討英國殖民對港人身份認同的破壞。

我們先談排斥及強加。將港人的政治自由，壓縮在半封閉的立法局，是排斥港人參政；將港人的政治自由，壓縮在諮詢角色，是排斥港人參與決策，將港人在政治領域、公共領域「他者化」，令港人無從、無權、無力當家與作主。當然，英國殖民者，透過不斷強化港人的經濟屬性，將我們的身份收窄在打工仔、消費者、炒家與老闆的經濟領域中。

回到我在謝菲爾德不知如何名狀香港的經歷。我不斷思索，為甚麼唸小學時，中文老師禁止我們使用廣東話作文？為甚麼老師既不教我們廣東話的九音，又沒有教我們普通話的四聲？為甚麼上中學時，老師不用我們學習英語發音，卻老是挑剔我們的發音？為甚麼我們不用學習香港地理、香港歷史、現代中國歷史，相反，卻要學習澳洲地理、歐洲歷史？

那是抑壓本土性、破壞本土與周遭（或「中國」）的關係、抬高英語等西方語言、文化、歷史、地理。

「對母語為廣東話的人來說，書寫『中文』已經是學習使用一種不同的語言，而這種語言的卓越感主要源於它長久以來作為書寫語的地位。尤其在香港這種書寫的意指總是在『標準』普通話與一般人耳聽口講的廣東話日常口頭語之間協商，抑止後者的本地特質，並將此等特質翻譯為『可讀』的中文，以作為一種共同的可行的流通語言。在另一邊廂，流

通語一直以來便是英語，亦即所有非西方文化在後殖民世界中所被迫共同趨向的一般性等同。像標準中文一樣，英語不僅是一種溝通工具；它也是語言及文化空間的僭奪者，一個把自身化為價值標準的僭奪者。」³

如果英國殖民政府的香港故事，是去政治化下僭奪香港本土特質的經濟神話，那麼，從 1997 年 7 月 1 日凌晨零時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開始，中央政府以及香港特區政府的香港故事，既屬強加的「大中國」國族論述，也可能吊詭地延續著英國殖民論述—香港去政治化、壓抑香港主體的經濟神話。

香港的「大中國」神話

我們先以首任特首董建華在 97 年 7 月 1 日香港特區成立儀式上的講話開始，檢視九七後當權者對香港的「大中國」國族論述。

「1997 年 7 月 1 日。香港，經歷了一百五十六年的漫漫長路，終於重新跨進祖國溫暖的家門……身為中華民族一分子，一個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……最重要的是：『一國兩制』的事業，完全掌握在我們中國人自己手裡……國家以嚴肅的法律形式，授予了香港舉世無雙的高度自治權。我們非常珍惜這權力，我們會負責任地運用這權力。香港新時代的巨輪，此刻在祖國尊重香港人，相信香港人，愛護香港人的旭日輝映下，滿懷信心，升錨啓航，向著振興中華，祖國統一的宏偉目標乘風奮進。」

很明顯，這是一篇以本質論為基礎來建構九七後中國—香港的關係。中國母體就在那裡，百五年前後皆如此；香港遊子回到母體，就可恢復中國人身份；其次，國家為大，香港為次。前者是賦權者，後者只是受權者；前者尊重後者，後者執行前者意志—振興中華，祖國統一。

在〈文化身份與流離失所〉中，霍爾指出，本質論高舉的共同歷史、共同經驗，對說明身份認同作用不大。他認為，共同歷史、共同經驗，對建構身份認同，有統一不同的作用，但不能作為認同的源起，因為它本身就經歷轉化。因此，既然起點已經改變，它根本不能令後殖民者，重新發現所謂原來的身份。

因此，帶有本質認同論的後九七香港故事，所謂「重新跨進祖國溫暖的家門」，根本不能發揮認同作用，因為港人變了，祖國也變了，再不能變回那原先的母體。也因為如此，現實上，即使認祖歸宗，港人也不覺得，這是自己心之所繫。港人只覺得疏離。

「從香港人的觀點來看，中國的自創，卻肯定不是香港的自創；中國重獲擁有香港的權利，並不等於香港重獲本身的文化自主權……香港所呈現的其實是一個非常要緊的問題，這就是一個所謂『本土』文化之中出現的主導與次主導之間的鬥爭。（這個問題卻極少在後殖民的論爭中受到注意。）」⁴

03 年特區政府強行通過被稱為廿三條的國家安全條例草案，更可說是「本土」文化中主導與次主導鬥爭最活生生的例證。特區政府為了發展國族身份，將港人身份最珍貴的部分，也可說是「殖民遺產」最重要部分——自由押下去，最終換來七一五十萬港人上街遊行，中產、專業人士紛紛走上街頭，董建華最後「腳痛」下台。

08 年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，因在美國右派報章《華爾街日報》撰文，促請美國總統喬治·布殊，利用北京舉辦奧運時機，要求北京改善人權狀況，被親北京力量指責為漢奸，更令人擔心在民族主義旗幟高舉下，港人的言論自由、表達自由，受到進一步打壓。而傳媒高度自我審查下，香港新聞自由更是步步驚心。

官方後九七香港故事，既含有悖論的本質認同論，彰顯大中國之餘，壓抑香港主體，又繼承了英國殖民論述，去政治化的經濟神話——後者痕跡在董建華的「就職演說」中尤其明顯。⁴

「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竭盡全力，保持香港一貫的生活方式，維持香港的自由經濟體系，堅守法治精神，發展民主，建立富於愛心的社會，確保國際大都會的活力……我將以忠誠的心志，堅決執行法律賦予香港高度自治的神聖責任，帶領六百五十萬富於創業精神的香港市民，堅定地按照『一個國家、兩種制度』的路向前進。」

董建華這次講話，在香港故事的發展上，竟和彭定康的殖民告別演說差不多一樣，同樣是重經濟輕民主，甚至將六百五十萬港人說是疑似創業家（或生意人），令人不禁大膽猜想，九七後官方的香港故事，不僅沒有解殖企圖，反而是在「保殖」。

這種「保殖」說法（將港人身份收窄至經濟動物）近年邁向頂峰。曾蔭權在 2007 年第三屆特首選舉上，喊出「我會做好呢份工」的競選口號，一方面將政治管理化，進一步矮化政治，另一方面更在港英殖民經濟神話論述以及董建華大中國國族論述上，將港人的經濟身份推向極致。一如彭定康所言，港人不僅辛勤、幹勁、勇敢；也如董建華所言，有創業精神；且搖身一變升級為「老闆」，因堂堂曾特首也只是打工仔。他是打工仔，那港人當然是老闆。

港人是老闆，繼續炒樓炒股，但不算選民，也不是公民；而香港也只是追尋私利的買賣場，不是讓我們當家作主、追求理想的社區。

最後，全國人大常委副秘書長喬曉陽 07 年 12 月宣佈，中央否決 2012 年實施雙普選，僅承諾可以在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以及 2020 年普選立法會。他這樣說：「大家才能真正把注意力和精神集中到發展經濟、改善民生上來。」英國「輕政治重經濟」或「政治不重要，只為經濟服務」的去政治殖民論述，猶如不死殭屍，繼續在特區狂舞。

夾縫中的後殖民身份

後九七香港故事，既有大中國國族論述，又保存英國殖民唯經濟論，將港人塑造為熱愛祖國但政治冷感的經濟動物：港人只可炒股炒樓，無法做真正選民、公民；傳媒加強自我審查，甚至出現李柱銘被指漢奸的白色恐怖事件，情況確實令人擔心。香港目前處境是否就像周蕾在九七前所言，處身於兩個殖民者之中？

「香港要自我建構身份，要書寫本身的歷史，除了必須要擺脫英國外，也要擺脫中國歷史觀的成規……香港第一樣要從『本土文化』內部對抗的，是絕對全面化的中國民族主義觀點。

我們都知道，民族這個觀念，往往是主導文化的工具，藉以維持既得利益，令無權者無法取得權力，並使本身的統治權長期合理化及合法化。在二十世紀，用民族這個口號來發揮政治力量，已被納粹主義及法西斯主義充分證明。」⁵

更何況我們可能處身兩大殖民者之間！

我們想繼續這樣嗎？

我們該怎麼辦？

「除了許許多多的共同點外，很多深刻又重要的歧異，也在建構我們目前身份，或者更貼切地說，既然歷史曾經對此作出介入，我們是怎樣變成目前這個模樣的。」⁶ 霍爾強調，歧異與相同在建構身份發揮同樣作用。因此，如果我們要尋求一套屬於香港人的香港故事，我相信，霍爾提示我們，該論述要重視差異—重視你、我的不同，以及我和我們的不同。我想，這是第一步。

也斯在〈怎樣可以通過別人的框架去說自己？〉中，對電影《浮世戀曲》的批評，引伸：「我想說的，毋寧是一種認識問題的方法。這電影《浮世戀曲》看問題是看『同』的一面……它眼中的香港是齊同的，是大家可以沒有疑難地認同的；另一方面，這電影又覺得可以沒有困難地認同對西方的電影、導演和演員。我覺得問題正是在這裡：正是在它表示認同，追求認同。而沒想到，要探討文化身份，正是要從歧異說起。」⁷

與此同時，霍爾又提出身份認同另一個認識論的問題，就是身份認同既是目前的我，也是演變中的我（*a matter of becoming as well as of being*），因此，身份是經歷轉化的，不是固定的，而身份認同從來是歷史、文化及權力的互相對奕，是一個定位的問題。因此，如果我們要擁有一套更開放的香港論述，對身份認同的定義，應該朝向身份認同的發展性、演繹性，而不是固定性、固有性。

霍爾在提出身份認同是不斷發展（**becoming as well as being**）後，再引用解構學大師德里達（**Jacques Derrida**）「歧異理論」（**Theory of Differance**）指出身份定位的游移性及後置性。定位不僅是可以變動的，且可以是後置的，在既不消滅其他身份蹤跡的同時，發展出新的身份。這讓被殖民者從固有的論述中釋放出來，發展屬於自己的身份，並說出自己的故事。

「這就是我們要回歸的非洲—然而，是從另一條路徑：在新世界內，非洲變成的模樣，以及我們理解的非洲：隨著我們透過政治、記憶以及欲望，重新講述的非洲。」⁸

霍爾提出定位認同理論中，從非洲人（**presence**）、歐洲人及美洲人角色中，試圖勾劃加勒比海人的身份。在討論牙買加身份與非洲人的關係時，有兩點令我印象難忘。

第一點是他描述不少牙買加人的非洲身份之旅，其中一個是 **Tony Sewell** 的紀錄片式檔案照（**Garvey** 的兒童：**Marcus Garvey**⁹ 的遺產）。漫長旅程包括英國及美國，但卻不在牙買加黑人主要家鄉—埃塞俄比亞結束，而在牙買加著名 **Reggae** 樂手 **Burning Spear** 及 **Bob Marley** 的音樂及歌聲中，在牙買加 **St. Ann Parish** 圖書館前的 **Marcus Garvey** 銅像終結。

也許，我們需要走這段路，不是回歸所謂根源、祖國，而是隨著我們在政治、記憶以及欲望的互相對奕中，發展我們的香港身份，訴說我們的香港故事。

在撰寫這篇文章時，心中不時泛起電影《春光乍洩》的對白：「不如我們從頭來過」，以及當中對他者所造成的傷害；何寶榮（張國榮飾）想到瀑布遊覽，最後，達成夢想的卻只有黎耀輝（梁朝偉飾）；黎一心返回香港，向父親道歉，但讓他最窩心最親近的地方，卻是台北；電影最後在台北一部行駛中的捷運列車終結。

第二點令我印象難忘的，是加勒比海人身份中的非洲想像。根據霍爾，這是被壓抑的場域，因背負過往黑奴身份緣故，在加勒比海文化中，和非洲相關

的聯想從未發聲（unspoken），也不知如何發聲（unspeakable）。過去如此，現在亦然。他指出，直到七十年代，加勒比海黑人身份，才被牙買加人承認。

霍爾認為，這種文化身份重新發現，務必有一些條件。只有在後殖民運動、民權運動、拉斯特法裡教文化運動、Reggae 音樂影響下，牙買加人的非裔身份，才可能被重新發現。

若說九七前後被擠壓的是香港本土特質，九十年代香港庶民文化運動（茶餐廳、涼茶鋪、街邊大牌檔，以及舊區、大澳棚屋等香港城市事物，被視為「香港文化」生活象徵）；以及 03、04 「七一遊行」；06、07 反對清拆天星、皇后碼頭事件，以及將來更多象徵香港意識全面醒覺的社會運動、文化運動，也是否可如加勒比海後殖民運動、民權運動般，對在地文化身份，發揮相近的作用？

「對於香港這個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，我的興趣在於它是一個不尋常的通道。這通道產生於歷史的意外，然而卻以一種舉世無雙的獨特性及生命力從十九世紀伸延到現在。」¹⁰ 這是周蕾差不多十五年前的話。十五年後，也許，意義更重大。香港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脫離英國逾百年殖民統治後，並不像世界其他殖民地一樣，走向獨立，而是回歸中國，實踐「一國兩制，港人自港」，那是史無前例的事。

霍爾在英國吶喊，解殖不是回歸根源，而是在權力、記憶及文化中，走出一條不斷發展自我身份的道路。經歷「九七回歸」、03、04 「七一遊行」、06、07 保留天星、皇后碼頭事件，相信我們已經在這條不尋常的道路上起步。

- 1 也斯：〈怎樣可以通過別人的框架去說自己？〉，收錄於《越界書簡》，香港：青文書屋，1996，頁 106。
- 2 霍爾在〈文化身份與流離失所〉一文中，引用法農的〈論國族文化〉。
- 3 周蕾：《寫在家國以外》，香港：牛津出版社，1995，頁 133-134。
- 4 周蕾，頁 97。
- 5 周蕾，頁 98-99。
- 6 Hall, pp. 225.
- 7 也斯，頁 109。
- 8 Hall, pp. 232.
- 9 Marcus Garvey 是牙買加出生的國族主義者，在美國發起回到非洲運動，並成爲後來不少民權運動家的精神領袖。英國廣播公司網站資料：
http://www.bbc.co.uk/history/historic_figures/garvey_marcus.shtml。
- 10 周蕾，頁 119。

參考資料：

也斯：〈怎樣可以通過別人的框架去說自己？〉，《越界書簡》，香港：青文書屋，1996。

周蕾：《寫在家國以外》，香港：牛津出版社，1995。

英國廣播公司網站：

http://www.bbc.co.uk/history/historic_figures/garvey_marcus.shtml。

Hall, Stuart. "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", *Representation: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*

Practices. Ed. Stuart Hall, London: Sag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, 1997.